

第七章

战后宗教的战争认知理念

日本文化是庞杂多变的，并且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日本的一些宗教曾在侵略战争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同时，也极大影响了战后文化的战争认知理念，特别是战后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去参拜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内牌位的靖国神社，引起了当年遭受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反对。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清醒认识宗教尤其是神道教的战争认知理念对日本国民心理的深刻影响。日本宗教文化的代表是神道教、佛教和基督教，其中神道教与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以及战后对战争的认识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

第一节 以神道教为主的日本宗教传统回顾

在日本宗教中，佛教和基督教是外来文化，而神道教则是日本本土文化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的精神灵魂、固有信仰、行为准则和伦理标准。神道教塑造了大和民族的形象、气质、秉性和特点，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日本社会结构各基本要素的协调组合和发挥功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神道教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

及战后日本国民对那场战争的认知理念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 神道教的起源和原始神道

神道教简称神道，是日本传统宗教，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神道教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日本民族意识形成发展的历史。

在日本原始社会，人们把各种自然现象和各氏族的祖先及象征生命源泉和农业丰产的女性偶像统统崇拜为神灵，而把祭祀神灵的宗教活动称为“神事”，也称为“神道”。

日本原始神道，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弥生时代。弥生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这一时期，日本已进入农耕社会，开始了最初的农业文明。人们为了祈求神灵的佑助使稻谷获得丰收，就在丰收后对神灵的恩惠进行报答并举行一些礼仪仪式，这就是早期的神道活动。礼仪活动由氏族、部落首领主持，集体举行。所崇拜的神灵也主要是谷神和土地神。人们划定的祭神时所在的场所叫做“圣域”，人们还在这种地方种植一些常青树作为神灵依附的所在，这些树被称为“神篱”。人们在“神篱”上挂起镜子等祭器，对神灵进行礼拜，有时祭祀活动在特定的岩石上进行，这样的岩石被称为“磐座”。祭祀时，他们奉上神饌和币帛。祭祀仪式结束后，随即举行神人同食的聚餐，这种活动称为“直会”。所有活动结束后，祭祀用具被完全打碎埋在“圣域”的泥土中。此时的人们相信神灵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会降临，因而没有给神灵建立固定的房屋，只是用一些巨石把圣域围起来，再拉上一些草绳，表示该处是神圣的。这种地方被称为“磐镜”或“矶城”。大约在公元3—8世纪，随着大和政权的建立和日本的统一，中国大陆儒、释、道三教的传入，再加上东北亚萨满教（一种原始社会后期所形成的、具有氏族部落

特点的、为中国赫哲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所信奉的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宗教)的影响,神道教逐步系统化,形成了具有天神、地祇和人灵的宗教。公元3世纪左右,日本历史进入古坟时代,产生了早期国家的雏形。当时的国王和贵族为了显示自己死后还具有所谓神威,就筑起了许多高大的坟墓,这就是所谓的古坟时代。这时的祭祀活动规模不断扩大,祭祀的形式也逐渐复杂起来。人们一改原来的做法,在祭祀时为神灵建造了临时性的房子,并在里面放置了许多神灵所依附的物件,如石、镜、剑、玉等。这些物件被称作“依代”。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依代”附有神灵的观念。随着这种观念被人们的普遍接受,为神灵建造永久性社殿逐步取代了建造临时房屋的做法,人们还把神灵所依附的物件也看作是“神体”、“御灵代”。随着永久性神社的出现,原始神道就发展到神社神道。

二 神社神道与神道教的确立

神社神道出现于公元3世纪左右,到8世纪时正式形成。最初,对日本民众来说,神社就是祭神,既无教义,又无教祖,因而人们只把它叫做神社。只是到了德川幕府中期后兴起的教派神道,日本人才称其为神道,这是神社与神道的区别。

神道神社出现后,祭神的场所由不固定的临时场地变为固定的社、宫、祠等。同时,由于国家的产生,神道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这样,日本神道逐步建立起了神祇制度,他们编创神灵的谱系,制定了祭祀神灵规范礼仪,并把祭神的处所分等分级,给予不同的称谓。其中宫(祀神场所的美名)的等级最高,社(又称屋代,祀神场所)的等级次之,祠(珍藏宝器的仓库)又次之。神社是宫社祠的总称。

日本的神社神道就是由原始神道发展而来的皇室神道和普通

神社神道。其中皇室神道又是神社神道的核心。

大和政权于公元 5 世纪左右统一了日本。此后，他们就把各个氏族部落的神统统归属到大和氏族神之下，还创造出了大和族的天地之神序列，编出了一整套以天皇氏族神为中心的神灵系统和祭神的礼仪，把皇室神道正规化、制度化、神圣化。公元 701 年，日本的中央政府颁布了《大宝律令》。《大宝律令》是日本封建社会的第一部完善的法律，它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封建制度的真正确立。这部法律不仅对当时日本封建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民事制度、刑法制度等做出明确规定，也对神祇制度做出了严格规定。《大宝律令》规定，国家设置祭神的专门机构——祇官，神职人员的最高官衔是神祇伯，其下依次为神祇大副、少副等官员。神职官员专门负责祭神事务。《大宝律令》还规定，皇室神社的祭祀为国家祭祀。各地区的主要神社由国家直接掌管，以首都为中心的重要神社称之为官币社，地方神社为国币社。两者统称为官社。祭天神的神社称天社，是原大和氏族的神社，祭地神的神社称国社，是原各氏族各部落的地方豪族系统的神社。延喜五年，即公元 905 年，由菅原时平等编撰的《延喜式》上记载的当时的“式内社”即官社就有 2861 个，其他小社祠数量就更多了。那些小神社又分为具有血缘性、地缘性的氏族社和个人自由参拜的崇敬社两种。这些小的神社在日本相当普及，几乎每一个自然村都有设置。

在皇室神社中，伊势神宫的地位最高。这座神宫原是祭祀伊势国地方神的神社。约公元 5 世纪时，皇族神天照大神的塑像移进该社，这里就成为了天皇氏神的神社。随着日本国家神祇制度的确立，天照大神上升为国家最高神，伊势神宫也升格为全国神社最高位置，至今仍是日本神道神社的中心。

日本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神社信仰除了伊势信仰外，还有出云

信仰（信仰以大国主命为首的神）、八幡信仰（信仰被祭于宇佐地方的八幡神）、御灵信仰（信仰御灵神，主要是为了消灾避邪）、熊野信仰（信仰熊野三地方神）、东照信仰（祭祀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信仰他为强有力的神）、稻禾信仰（信仰稻谷神）、富士信仰（山岳信仰之一，主要是崇拜富士山日神）等。

随着国家神道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神社神道逐步变成了为日本国民所接受的具有神灵信仰的宗教了。

三 学派神道(理论神道)的形成

学派神道又称理论神道，其主要使命和作用是为神道教建立系统的教义。它也是日本封建时代神道派别的总称。学派神道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从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传入的平安时代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

原始神道根据巫术形成了“产灵”、“斋戒”等观念；神社神道根据《大宝律令》、《延喜式》等律法建立了完整的神祇制度，形成了丰富规范的祭祀仪式。但这些作为民族宗教还不具备堪称教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国具有丰富思想理论儒释道三教的传人促使了神道教理论体系的创立。神道教教义就是这种日本固有民族宗教与外来宗教和思想体系相融合的产物。学派神道就是祭祀和教义相统一的成熟的神道教。

由于受到外来宗教和文化的不同影响，神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教义、不同的派别。按照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性质的差异来分，学派神道可分为四大类，即佛教神道、儒学神道、复古神道和教派神道。其中又分为很多派别，主要有：天台神道、真言神道、法华神道、伊势神道、吉田神道、度会神道、吉川神道、垂加神道、白川神道、土御门神道、古学神道、平田神

道等。

（一）佛教神道

佛教神道是佛教与神道融合的产物，是在佛教影响下而产生的神道派别，又包括佛主神从的佛教神道和神主佛从的佛教神道。公元6世纪中期，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后，立即在各地传播开来。奈良时期已形成了神佛相融合的趋势，平安时代更加流行。神佛融合的神学依据是所谓的“本地垂迹”，即佛是为了普渡众生而降临日本的，成为日本的神灵。大乘佛教认为，佛有众多的分身，因此降临日本是必然的。这样就出现了许多供奉佛陀的神社，形成了佛教神道。这就是主张佛主神从的佛教神道。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对佛主神从的本地垂迹说的神道派别，他们主张以神道为主体，然后吸收佛教、儒教、道教等派别的思想。这就是神主佛从的佛教神道。

主要派别有以下诸派：

1. 天台神道

天台神道是佛教神道的一个重要派别。它兴起于平安时代，以“本地垂迹”说和佛教天台宗空、中、假三谛圆融的教义而创立。天台神道把释迦牟尼当做是一切神、一切存在的本体，也把他看成是日本天台宗大本山比睿山保护神“山王”（日吉神）的本体。该派神道还神秘地认为，汉字的“山王”二字都是由纵三横一和横三纵一构成，三画就是三，一画表现一，因此“山王”就是中国佛教天台宗所倡导的“一念三千，一心三观”学说的体现。因此，天台神道又称“山王一实神道”。

2. 真言神道

真言神道也是以“本地垂迹说”为思想基础，是佛教真言宗与神道相融合的主张佛主神从的佛教神道。该派神道以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的教义来解释神道，认为世界万有的基本要素是金刚

界和胎藏界，而大日如来是统一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的本体，一切神都是大日如来的化身。表现“德智”方面的称金刚界，表现其理性方面的称胎藏界。他们把伊势神宫的内宫所供奉的天照大神称作胎藏界的大日如来，把外宫所供奉的丰受大神称作金刚界的大日如来。该派神道还从密教的立场出发，认为国常立尊、国狭槌尊、丰云野尊三神乃语、身、意三密相应的三身，三身即一，就是大日如来佛，并以此推论日本国就是大日如来的佛国，神代就是自天地开辟以来到神武天皇之前各代诸神。天神七代，既是过去的七佛，又是阴阳北斗七星。由于真言神道具有调和神道与佛教两部分的特征，所以又称“两部神道”。后来，两部神道也成为神佛融合神道的统称。

3. 伊势神道

伊势神道又称度会神道和外宫神道，是由伊势神宫外宫的祠官度会行忠、度会家行、度会家昌等人创立的。该派反对佛主神从的本地垂迹说，坚持以神道为主，提出了儒释道从属神道的理论。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把外宫的祭神丰受大神与宇宙本源神国常立尊合为一体。他们认为，本源神具有“五行”之一的水德，而丰受大神就是具有水德的食物之神，伊势内宫所供奉的天照大神是具有火德的日神，二神有如水火相依，这从理论上阐释了伊势外宫和内宫的关系，并以此提高外宫的地位。伊势神道还强调“神皇一体”的观点，认为神是君皇的“内证”（本质之意），而君皇则是神的“外用”（即表现之意）。这种理论是日本神国、天皇神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日本神国思想理论奠定了宗教基础，也使神国思想借助神道逐渐摆脱了佛教的影响和支配。

4. 吉田神道

吉田神道由室町时期的吉田兼俱创立，又称“卜部神道”、

“唯一神道”、“元本宗源神道”。该神道反对本地垂迹说，主张以神道为主体、为最高，吸收儒、佛、道思想，并认为儒佛道只是润饰神道、为神道增添光彩之物。该神道是神主佛从神道。其教义主要内容有“根叶花实说”、“守心之道”等观点，主张神秘主义的修行方式，曾策划迁移伊势神宫失败，后与日莲宗合作取得巨大成功，曾称霸神道界三个多世纪。后又不断吸收儒家思想，逐渐改变着神道受佛教支配的局面，最终由儒学取而代之。

（二）儒学神道

儒学神道是神道与儒学相融合的产物，是以接受儒学思想影响为主而形成的神道派别。儒学神道也分为两种情况，即儒学家把儒学思想扩充到神道领域而形成的儒学神道和神道家站在神道立场上主动吸收儒学思想因素而形成的儒学神道。

主要派别如下：

1. 理学神道

理学神道也称吉川神道，是由吉川惟足把朱熹理学与吉田神道相结合而创立的。吉川惟足所著的《神道大注意》、《神道大意讲读》是该神道的经典。他认为理学神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朱熹理学中的“太极”就是日本的国常立尊，一切神都是太极的具体表现，因而只有理学神道才可以包括一切，可以治理天下，而其他神道只是一般神道，只不过是“行法神道”而已。吉川特别推崇儒家理论所强调的君臣之道，认为“人伦之道以君臣之道为最高”，“君臣之道，万古不易”，并主张以此君臣之道贯注于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之道。他还运用中国的“五行”学说来解释社会伦理，把“五行”中的“土”看作万物之母，把“金”看成是“五行”中最重要的一项，并认为在人心方面，金就是义，是“敬之用”。“敬义一体”为人伦道德的根本。

2. 垂加神道

垂加神道由京都妙心寺僧人山崎暗斋把朱熹理学与神道教义紧密结合而创立。垂加二字是取自吉川惟足授予山崎的“垂加灵社”之号。垂加神道以儒学思想为主体，又吸收阴阳五行说和理气说，来阐释日本神道的“神代”神话，强调“天人唯一说”。他认为，神就是天地之心，天宇中主神育万物，天照大神和猿田彦大神（守护国土之神）都顺承他。这两种神分别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知之的圣人。这二圣之道就是神道。他还以“土金之传”来解释“敬”字，他认为，天地、阴阳、人道都是从土金二物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人们应该处处尊敬它们。山崎还以此提出了对天皇的绝对信仰，严格遵守大义、名分等封建道德观，并宣传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神国”思想。垂加神道对日本近代社会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神道对后来的复古神道的兴起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3. 理当地神道

理当地神道由林罗山创立，是儒学学者阐述神儒关系的一种神道。林罗山批判儒佛不二的思想，力图排除佛教对神道的影响，为神道奠定儒学基础，倡导神儒结合。他还把朱熹理学的“主敬”、“持敬”学说灵活运用于神道，认为：“心为宅，神为主，敬亦为一心之主宰，故有敬则神来。若无敬则亡本心，故为空宅。神何为来止乎？唯敬乎！敬所以合于神明也。”该神道主张神儒一致论，为儒学发展扫除了佛教障碍，为神道发展找到了儒学支持。

（三）复古神道

复古神道是神道教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学派神道。复古神道是江户后期从日本国学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国学是受中国儒家学说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古典文化研究学派。复古神道反对把神道依附于佛教，反对用儒佛思想来解释日本古典文献和日本神

道，主张依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典文献的本意来阐释和发扬日本神道。复古神道的创始人是贺茂真渊，代表人物是本居宣长。本居宣长认为，接受神道、天皇之道就是人类之道，人对神应绝对信仰。他的弟子平田笃胤继承其思想，并创立了复古神道的教义理论。平田笃胤重要著作有《古道大意》、《古史证》等。他的学说被称为平田学、平田国学，也称他所创立的复古神道理论体系为平田神道。平田神道思想成分实际上非常复杂，既有儒学影响，也有基督教思想影响。但是，平田笃胤是站在日本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的立场上，竭力抨击其他宗教，致力于用“记纪神话”（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来阐释日本神道。他认为，宇宙万物的创造之神就是天宇中的主神，世界是由现世和隐世构成的，现世的世界由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统治，隐世幽冥界则是灵魂的世界，由大国主命掌管。人死后要到幽冥界去接受大国主命的审判，并根据生前的表现而得到相应的报应。在儒学的影响下，复古神道特别重视伦理纲常中的孝道，主张最大的孝道包括孝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他把孝道扩展到了对神代的神灵崇拜和对天皇的忠诚。他还宣扬日本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理当统治世界，日本的国体皇位尊严无比。在政治上，复古神道力主复古。复古神道的这种思想成为了明治维新和建立国家神道的理论基础。信仰复古神道的人大多是倒幕复古、明治维新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因此，复古神道对日本近代国家神道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

（四）教派神道

德川幕府后期，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制度开始走向衰亡，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和城市贫民因遭受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和外国资本的多重威胁和压迫，掀起了倒幕和排外运

动，在信仰上，普通民众对平等、救助弱者等内容的宗教渴望大大增强了。与之相适应，在复古神道产生的同时，神道教也出现了一股民众化的倾向。从德川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之前（1603—1867年），日本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既有教义也有教祖和组织的神道派别。这些神道派别通常被称为教派神道、教祖神道或宗派神道。实际上，教派神道是神灵祭祀与神道宗教分离后，从国家神道中分离出来的民间神道。

教派神道并不完全是由民众新创立的，其中有些派别是由神社神道演化而来的，有些是从民间神道信仰发展而成。从总体上看，民众化神道是教派神道的主流，这也是日本现代新神道宗教的直接和重要渊源。教派神道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农村为基础，由教祖倡导融合各种神道主张而形成的神道宗教，如黑住教、天理教、金光教等；二是继承、重组江户时代的山岳信仰而形成的神道宗教，如实行教、扶桑教、御岳教等；三是明治初年站在“唯神之道”立场上组织起来的神道宗教，如神习教、神道修成派、大成教等。进入近代社会后，第三类神道开始把第一、第二类神道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因为它的教义与国家神道的教义相近，其活动受到国家神道体制的保护和支持。

教派神道在战前有 14 个教派，后因神宫教改组加入了财团法人神宫奉斋会，所以通常称为“神道十三派”。它们是神道大教（原神道本局）、黑住教、神道修成派（原修成派）、出云大社教（原大社教）、扶桑教、实行教、神道修习派、神道大成教（原大成教）、神习教、御岳教、天理教、楔教、金光教等。教派神道的共同特点是各个教派均有自己的教祖，有独立的教义和比较严密的组织；虽然都是信奉神道教义，但一般不以某一神社为活动中心。战后，神道十三派结成了“神道联合会”。后来，由于神道修习派、神习派和天理教的退出和大本教的加入，到 20

世纪 70 年代,“神道联合会”所属的教派共有 11 个。此外,这些教派又分为 82 个教团。

第二节 法西斯国家神道及战后神道教的变迁

日本近现代神道教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从明治维新至 1945 年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是日本神道教发展鼎盛时期,发展成了国家神道。战后,神道教被降格为一般宗教,但仍在日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一 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帮凶——日本国家神道教

国家神道教是神社神道发展的历史产物,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以皇室和国家为核心的、服务于日本强权政治的、为法西斯侵略战争服务的国家宗教形式。

国家神道不同于古代神道的祭政一致的皇室神道,而是以鲜明的为日本近现代法西斯专制政治服务特征并融合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独特作用的特殊神道。这种神道在明治维新后居于国教位置被称为国家神道。国家神道被明治天皇确定为国教。此后,国家神道在行政教育等方面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对日本民众进行敬神爱国、尊祖崇皇教育,把复兴皇道和崇拜天皇作为最高要求,他们要国民尊奉皇祖神天照大神,宣扬“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的观点,为日本近代社会建立天皇制国家政治体制鼓吹呐喊。

国家神道的形成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1868 年至 1889 年是国家神道的形成期。明治维新初期,天皇曾下令神佛分离。这是因为当时的佛教寺院在幕藩制度下已经变成了封建统治的基层组织,享受着种种封建特权,不利于天皇制的统治,也使神道教的

地位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当神佛分离的命令一颁布，蓄谋已久的神道教的神职人员，立即伙同国学家、儒学家和维新后新政府的地方官员，掀起了排佛毁释的风潮。佛教遭受了沉重打击，而神道教一跃取得了宗教界霸主地位。

在颁布神佛分离令的同时，天皇还下令重新恢复神祇官。神祇官的职责除了负责祭祀天地之神、八神和历代皇灵以外，还负责对民众的宣传教化工作。国家把全国所有神社进行统一控制管理，并以祭祀天皇祖神的伊势神宫作为神社的本宫。天皇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大教”的一元化精神统治，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后，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得到发展，要求实现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不得不在宗教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明治四年（1871年）神祇官被降格为太政官管辖的神祇省。1872年，又改为教部省，并把其他宗教也纳入其管辖之下。这样，明治政府的宗教政策由激进的神道国教化转变为有组织的国民教化。教部省制定的“身行敬神爱国”、“心明天理人道”和“奉戴皇上并遵守皇旨”三条教则，是国民教化的准绳，也是当时国家神道的口号式教义。

1889年至1900年是国家神道教义的完成时期。由于教部省的设立和神佛合并布教政策的实行，佛教势力卷土重来，他们极力宣扬人民有“信教自由”口号。同时，神道教方面也暴露出了教义贫乏和布道活动僵化的毛病。这样，为了维护国家神道的至上地位，与教部省同时成立的大教院不得不撤销，代之以神通事務局，接着，又宣布祭祀与宗教分离，并相继承认原属神道教务局的教派神道独立。1889年的明治二十三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国家神道对其他宗教具有统治地位。1890年又颁布了《教育敕语》（见第二章）。《教育敕语》不仅是日本近代社会的教育方针，也是国家神道的教典（当然日本军人

还要加上《军人敕谕》)。从此,国家神道成为了超宗教的非宗教国家祭祀而凌驾于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巅,天皇的《教育敕语》成为了国家神道的真教义。这样,日本的国家神道实际上就成为一种以天皇为教祖、以天皇的命令和话语为教义、全体国民必须无条件信仰的国家宗教。作为教义的《教育敕语》要求每个日本国民通过“敬神崇祖”来“灭私奉公”、“忠于天皇”,国民应时刻准备,为天皇制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

从《教育敕语》的内容不难看出,国家神道要求全体日本国民成为它的忠实信徒,要在任何情况下,毫不犹豫地为其卖命。

1900年至1931年是国家神祇制度完善时期。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家神道进入了制度建设阶段。天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国家神道成为封建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一是完善神社制度。把神社与地方政府相结合,加强对当地居民的教化;国家以财政支持的方式重新创建追随国家神道教义的神社等。新建的神社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祭祀战争阵亡者的神社。如靖国神社、招魂神社、护国神社等;第二类是祭祀南北朝时期南朝方面忠臣的神社。如凑川神社、藤岛神社等;第三类是祭祀天皇皇族的神社。如镰仓神社、平安神宫、明治神宫等;第四类是在殖民地、占领地建立的教化当地居民的神社。如朝鲜神社、建国神社、昭南神社等。其中,靖国神社作为把天皇、神社和军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宗教设施,在鼓吹天皇崇拜和进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培育方面,起到了非常突出的恶劣作用。二是利用国家神道“善导”国民的思想意识,以修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蓬勃兴起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日本国民思想、心理及行为产生的“误导”。三是利用国家神道来缓和日本发展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后所引起的尖锐的国内外社会矛盾,并试图以此转嫁各种矛盾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

各方面的严重危机。

1931年至1945年是国家神道成为法西斯国教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嫁危机,缓和国内的矛盾,日本天皇专制政府开始转变为法西斯侵略政府。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的关东军精心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略中国东北的野蛮行为。在日本国内,天皇法西斯政府为了把全体国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统一到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行动中,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神道的至上地位,还命令其他宗教形式,如佛教、基督教等都要积极为侵略战争服务。这一时期的整个日本宗教,完全变成了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帮凶和走狗。1937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又制造了“七七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反动的国家神道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侵略战场上,都成为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一种侵略武器。1940年,天皇专制政府借日本纪元2600年之机,成立了神祇院,再次明确了国家神道的国教地位。为更有效地在侵略战争中发挥作用,天皇专制政府又给国家神道的教义增添了所谓“圣战”、“八纮一宇”、“大东亚共荣”等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公开宣扬、叫嚣日本要用武力去征服、统治全世界的所谓“神圣使命”。日本天皇专制政府还颁布了“宗教团体法”,号召日本的所有宗教团体都要无条件地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和侵略战争服务。“宗教团体法”就是日本宗教界的战争动员令,日本的所有宗教团体和个人也都参与到了这场侵略战争中。这一时期是国家神道的顶峰时期,也是最后时期。此时全日本有大小神社8万余个。1944年9月,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节节败退的形势下,由神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30万宗教家组成的“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团”粉墨登场了。日本的佛教、基督教等教派也从此留下了不光彩的纪录。1945年,随着法西斯军国主

义被彻底打败。国家神道作为法西斯的国教被赶下了圣坛，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二 战后日本神道教的变迁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战后，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占领了日本。在美占领军的指令下，日本开始了战后民主主义改革。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和彻底埋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彻底改造为法西斯战争效力的各种政治组织和团体。经过民主主义改革，带有君主立宪性质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体制在战后日本形成了。从宗教的角度看，那种祭政一致的体制被铲除了，一个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新体制建立起来了。在民主主义改革浪潮中，日本战后宗教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宗教派别、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和宗教体制都表现出了与战败前迥然不同的景象。为了对在侵略战争中有恶劣表现的神道教和其他有不光彩行为的宗教进行改革，战后日本政府颁布了《神道指令》，对神道教的地位、性质进行了重新规定。《神道指令》及战后日本的一系列法律对曾经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神道教以沉重打击，一方面以法律的形式结束了国家神道的国教历史，否定了天皇的神性及伊势神宫的国家宗庙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政治属性，把神道教降格为一般民间宗教。1946年元旦，当时的裕仁天皇发表了《人格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下凡到人间的神，自我否定了天皇拥有的神权。随着国家神道教的实际教祖——天皇被推下圣坛，神道教的特殊地位消失了；另一方面，战后的民主体制和法律为了保护日本的民族宗教信仰，允许神社神道在清除国家神道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等反动思想因素之后，可以作为与国家权

力、政治制度无关的、与其他宗教平等的民间宗教而继续存在。

1946年2月，伊势神宫改为神社本厅，注册为宗教法人。但神社本厅仍具有特别统辖权力，它管理着全国的近八万所神社，占全国11万所神社的72%，它还在各都道府县设置神社厅作为基层组织。至今，神社本厅仍是全日本神社神道的中心。其余的三万多所神社，或成为独立神社，或组成“神社本教”。

战后初期，神道教曾一度萎靡。这主要是因为神道教在侵略战争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失去了威信，同时，由于美国大力支持，人们争相信奉基督教。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神道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获得了重新发展。这期间，日本的右翼势力极力参与神道教的复兴，企图使神道教由日本的民族宗教向世界宗教发展，此外，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等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使靖国神社产生了一种对战争特殊认识的象征意义，这无形中为神道教的重新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8年，日本皇太子开创了神道结婚仪式，此后国民纷纷效仿，这大大提高了神道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1967年，日本政府改“纪元节”为“建国纪念日”。1969年，日本颁布了《靖国神社法案》，规定神社国营化。另外，从战败至今的日本大部分在任首相多次以政府首脑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也在威胁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这样，日本战后神道教与政治的关系又出现了越来越密切的倾向。

第三节 战后神道教的战争认知理念评价

从宗教学的角度看，战后日本社会对那场侵略战争产生不正确和错误的认识是与神道教对日本国民的深刻影响有着直接关系的。战争结束后的20世纪后期，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汹涌而

至，日本经济已经完全融于全球经济脉络中，然而，任何国家和民族绝对不会甘心情愿地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和自己独特文化与民族性格。神道教是日本大和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包含着日本人的深厚民族情感和民族性格积淀，日本国民自然对其还有一种特殊的爱怜情感，神道教在当代的日本社会中，仍存在着得以发展的深厚的国民心理和性格基础，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经济的繁荣发达，人们对那场战争造成的恶果的认识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淡漠，并且，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对那场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灾难的认识只局限在了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上了。基于此，神道教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日本民族性格和文化的象征。虽然战后民主主义改革中制定的和平宪法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日本政界和神道教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神道教越来越成为日本政治家们取悦民众、争取民众支持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神道教本身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也在极力地扮演着越来越多的政治象征角色。这样，在侵略战争时期曾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神道教又具有了再次发展和复兴的机会。而日本民众接受神道教，就意味着对那场战争的性质的认识接受了神道教的观点，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对曾经起过恶劣作用的神道教义产生认同心理，最终导致对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无法产生正确认识。

第一，神道教，尤其是以靖国神社为代表的神社神道，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的象征意义，有意识地把包括二战期间所有阵亡的日本士兵（当然也包括东条英机等 14 名甲级战犯）当做日本的“民族英雄”来供奉，而日本政治家和民众则以“信仰自由”为理由予以认可，结果，就出现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朝拜甲级战犯灵牌的严重事件。

那么，日本大部分在任首相为什么要去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作为神社神道教的一个活动场所，里面究竟有什么？

日本政治官僚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是日本政治与宗教相互利用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表现，也反映了日本政界与宗教界对那场战争的认可与膜拜态度。

靖国神社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市的千代田区九段，其前身为“东京招魂社”，建于1869年。当时是为了祭奠1868年东征大总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追讨幕府军时阵亡的官兵而修建的。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日本战败之前，靖国神社作为国家神道的支柱担负着向国民灌输激励法西斯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作用，曾有着极为不光彩的经历。1945年，日本法西斯被打败后，按照新宪法的规定，靖国神社脱离国家管理，1952年9月成为东京都知事批准设立的宗教法人单位。

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规则第三条对设立靖国神社的目的和神社的性质作了这样的阐述：本社依照明治天皇关于“安国”的有关圣旨，设置本社是为了纪念为国殉职的人们、举行神道活动的祭祀、弘扬神德、教育和培养信奉本社祭神的其他崇拜者、为社会谋福利，以及为实现本社的宗旨而开展其他的有关活动。

靖国神社在战后仍以明治天皇的圣旨精神确定自己的性质，可见，靖国神社仍然是把天皇作为神社神道的教祖，把天皇的“敕语”作为教义，这就与国家神道之间有了极为密切的相承关系。日本的《神道辞典》是这样解释靖国神社的性质的，靖国神社是“祭祀那些曾经作为护国之神的英雄的灵魂，包括明治维新前后为国捐躯的英雄，以及在其后相继爆发的‘西南之役’、‘日中·日露战争’、‘济南事变’、‘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中因忠于天皇而为国献身的人们的英灵”。当然，日本内战中被认定为“贼军”的以及普通百姓在战争中非因公死亡者不包括在内。这个解释足以说明靖国神社是把日本近代社会以来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的阵亡的侵略

士兵当做“民族英雄”来供奉、祭奠的。

事实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明治维新以来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的灵牌绝大多数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内，数量约有 250 万人。靖国神社院内两座石塔的 16 面浮雕绘有日军“击破清朝北洋水师”、“攻占天津”等战绩的内容，陈列馆内外展示的也是“为国捐躯”的士兵及军马军犬的遗像和事迹。随着战后神道祭祀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参加祭祀人数的不断增长，1978 年，当年曾在东京国际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的以东条英机为首的 14 名日本甲级战犯的牌位也被移进了靖国神社供奉。这样，靖国神社完全变成了一个供奉、祭奠已死亡的日本侵略者的场所，其政治象征特色越来越突出。

日本的大部分历任首相为了拉拢人心和树立自己的爱国形象，为了政治需要，不顾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故意招摇过市般地屡屡参拜靖国神社。这说明，日本政府、当代政治与神道教依然密切相连，也说明日本的政界、宗教界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不仅没有认真反省和批判，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民族“英雄行为”加以美化、歌颂。这实际上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在政治、宗教、文化等领域中阴魂不散的表现。这更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附：

战后日本历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情况

东久弥宫稔彦	1945 年 8 月	1 次
币原喜重郎	1945 年	2 次
吉田茂	1951—1954 年	5 次
岸信介	1957—1958 年	2 次
池田勇人	1960—1963 年	5 次

佐藤荣作	1965—1972 年	11 次
田中角荣	1972—1974 年	11 次
三木武夫	1975—1976 年	3 次
福田赳夫	1977—1978 年	4 次
大平正芳	1979—1980 年	3 次
铃木善幸	1980—1982 年	8 次
中曾根康弘	1983—1985 年	10 次
桥本龙太郎	1996 年	1 次
小泉纯一郎	2001—2004 年 1 月	4 次

第二，日本战后神道教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民众对那场侵略战争的认知理念。战后神道教虽然降格为民间宗教，但并没有改变其宗教的性质，而宗教问题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包含着大和民族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积淀。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力量的壮大和美军占领对民族自尊心的伤害，传统的神道教自然容易唤起日本国民的民族情感，自然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国民的认同。而神道教在那场侵略战争时期则是其发展的顶峰阶段、完全成熟阶段，战后虽然对其进行了民主主义化改革，但其战争时期的那种至高无上地位的影响和许多崇拜天皇、鼓吹战争的思想因素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再加上遍布全国各地的神道神社是人们日常集体活动、个人重要活动的场所，神社的礼仪、规则随时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同时，日本战后和平宪法所规定的“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悖论。新宪法主张“信仰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国家神道教在政教领域中的霸主地位，给民众自由信奉其他宗教的权利和机会。然而，“信仰自由”也成为了战后神道教继续崇拜天皇、崇拜侵略战争、供奉侵略战争罪犯灵牌的理由和“权利”。可以说，在神道教的影响下，日本国民对

战争性质的认识将始终不会具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他们的战争观念只有对日本、对天皇的“顺从”和“反抗”之分。凡是对日本和天皇的顺从就是他们的敬奉和崇拜对象，反之，他们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

第三，神道教作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典型形态，其文化意义将长久存在，将对日本国民的心理意识、伦理道德、政治倾向产生深远影响，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日本国民的国家理念、社会发展理念和战争认知理念。神道教在日本历史上始终是从属于政权之下，始终是为政权、政治和天皇服务的，这种独特的宗教发展历程使它的特点非常明显：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宗教活动主要是向神灵祭祀祈祷；祭祀的神灵众多，主神与众神并存，自然神与社会神结合；祭祀的现实性很强，一般是为了实现生活中某种具体要求或愿望或者是为了避免灾祸而去祈求神灵；神人一致、祭政一致、活神信仰、尊奉皇国主义，等等。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尊崇皇国主义。因为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天皇都是一个实在存在的最高权威或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这个活神在现实生活中比任何神灵都更加强大有力，天皇是国家的灵魂、是国家的象征，信仰天皇就是热爱神国日本，这是神道教的本质和核心。神道教宣扬的皇国主义不论是在明治维新时期，还是在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期，都是影响和吸引日本国民的核心思想。信奉神道教的日本国民，天皇是精神和行动的强大支柱。即使在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裕仁天皇发表了《人格宣言》，声名自己不是神，但所有的日本国民，所有的日本神道教信徒都非常清楚，天皇那是为了挽救神国日本，为了应付美国占领军的逼迫的不得已之举。他们意识到正是天皇的“忍辱负重”，日本国家才得以在战后存在发展。所以，战后的神道教依然以天皇的“圣旨”为行动指南，依然把天皇当做实

际上的教祖。他们深信，尊奉天皇，就是热爱神国日本，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的。这就是日本国民的国家观念和战后社会发展观念。既然天皇是日本国民的精神领袖和精神支柱，天皇曾经下达“圣旨”批准的对亚洲各国的“军事占领”和“大东亚战争”就不应该予以否定，就是日本“神国”的“圣战”，就更不会有什么战争“罪责”。这就是日本国民基于神道教的战争认知理念。

总之，通过战后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神道教仍是日本的核心宗教。以神社神道为主的神道教在战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为一种宗教，神道教是君临于佛教、儒学、基督教等宗教思想之上的日本民族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神道教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情感，是一种日本民族文化代表和象征；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神道教越来越与日本政治互相配合，成为了一种政治、政府表现特殊思想理念的仪式。神道教的这种作用将长时间的持续下去。